

访《永不磨灭的番号》编导徐纪周

“李大本事就是我”

本报记者 钱 力

“上天入地，谁都不惧，拜来拜去，先敬自己……”如今，这首歌已经被广泛传唱。朗朗上口的歌词，轻快诙谐的曲调，不知情者，谁会料到，这会是一部抗日题材战争片的片尾曲？

与这看似不着边际的调子一样，《永不磨灭的番号》(以下简称《番号》)在北京电视台甫一开播，几乎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镜：战争题材电视剧还能这样拍？而随着剧情的不断发展,《番号》在北京电视台的收视率节节攀升，创下了同一时段全国收视第一。如今，该剧的第二轮回炉——央视一套两集连播、北京电视台4套黄金档4集连播，再次掀起了新的收视热潮。

“10月6日，我们还将在云南、陕西、河北等6家卫视播出！”《番号》编剧、导演徐纪周兴奋地告诉记者。

“李大本事就是我！十个月里，我亲历了每个人物的痛苦！”

采访在徐纪周的导演工作室进行。硕大的电视屏幕，展柜里的大幅海报、冲锋枪，各处散置的书籍，不拘一格的横躺沙发……徐纪周悠闲地斜靠在沙发的一端，目光狡黠，语速极快，时而果断抓住记者提问中的关键词予以反击，活脱脱一个现实版的“李大本事”。

“李大本事当然就是我！否则我怎么能把他创作出来呢？”徐纪周调侃中带有几分得意。他采用剧中一句台词来形容这个角色，“诸葛亮与吕布配在一起，有勇有谋。”相对于《亮剑》里的李云龙,《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徐纪周认为，李大本事更加狡黠，也更实际。

剧里的其他角色，如陈峰、吸铁石等等，徐纪周称，也到处闪现着自己的影子。

将创作这部戏比作是“十月怀胎”，一点都不为过。徐纪周



徐纪周在给“李大本事”说戏

编剧的灵感来源于2008年读的一部两万字的网络小说。从最初的构思、人物设计，到创作、成型，前前后后他一共花费了整整10个月的时间。回忆起创作过程，徐纪周的眼神中掠过一丝沧桑：“我在写每部戏时，都会‘抑郁’。我把自己封闭在戏里，不管世间的喜怒哀乐，只与我创作出的人物做着不间断的情感置换。他们每个人的痛苦，都是我真真切切体味过来的。”

徐纪周的创作过程，充满了不为人知的艰辛，“我眼前就有一台电脑，每天看着恨不得把它给砸了。烦得要死。每次恨恨地发誓再也不干了，到了第二天，还是忍不住拿出剧本继续写。我特别瞧不起我自己……”经历了茶饭不思、坐卧不宁、头晕眼花之后,《番号》终于成功分娩。

“因为我实在太爱它了。”在《番号》开播之前，徐纪周充满了忐忑。

“把苍凉悲怆的东西抹上粉，再现原生态的生动和草莽。”

在徐纪周的“导演阐述”里有这么一段话：“《番号》没有太多的厚重，也没有太多的人文情怀表达，而在人物个性的张杨挥洒

上，尽显酣畅淋漓。”在创作之初，他就把这部戏称为抗日版的《水浒传》。目的就是告诉观众,《番号》具备了“传奇体”的特质，和“水浒”一样，是人物戏。

对于剧中人物的设计，徐纪周先从地域特征入手，然后再根据自己能够触摸得到的人物性格进行细致刻画。“我希望在大家熟知的地域概念中，把人物身上的优缺点放大。”于是，在剧中，山西人的精明、算计，安徽人的鲁莽、直爽，湖南人的“怄”，在一系列人物身上都生动体现。八路军、国民党部队、土匪和帮会联合组成了一支抗日队伍，这是该剧最大“出格”之处。但是徐纪周却不这么看，因为“那时候就是这些人在抗日。”

《番号》在表现形式上借鉴了不少评书、章回小说的手法，这来源于徐纪周平日大量的阅读积累。“我看东西比较杂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什么类型的都看，《番号》里面的人物，都能在中国的评书、演义、神话故事中找到影子。”徐纪周认为，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来表现特定历史时期，是为了突出戏剧性。如果缺乏戏剧性，也就失去了观众。

“所以，我是把一些苍凉悲怆的东西上成粉，换一种喜剧的方式表达。戏剧性的关键就在于讲



《永不磨灭的番号》剧照

述的角度与方式。”徐纪周说。

“‘番号’就是需要被认可，戏里戏外都是。”

前不久,《番号》的专题研讨会在北京电视台举行。研讨会上，有专家特别指出《番号》与当下精神的对接。谈到这一点，徐纪周深有感触：“李大本事这，群众对于番号的追尋，事实上也反映了当下人对于自身价值得到社会认可的渴望与追尋。它更多地表现了一种寻求被关注、被认可的過程，这恰恰是《番号》与当下精神最大的对接点。”

在《番号》的最后三四集，徐纪周称，完成了自己情怀的表达。“收视率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没有个人情怀的表达，这部戏就没有灵魂。”对于徐纪周来说，对这部戏的认可，收视率仅仅是一个方面。在满足了商业性的需求之后，还需得到官方的认可、行业内的认可、口碑认可以等等，才能够算是真正的成功。

“《番号》的被认可，也是对选择这种方式来表现特定历史时期，是为了突出戏剧性。如果缺乏戏剧性，也就失去了观众。”所以，我是把一些苍凉悲怆的东西上成粉，换一种喜剧的方式表达。戏剧性的关键就在于讲

些灵感，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若干年后，我希望观众还能记得戏中的人物。”

从最初的忐忑、诚惶诚恐，到如今的踏实，徐纪周的情绪一直跟着《番号》的播出而起伏。“这一仗不能败，必须得赢，而且得共赢。因为无论是搜狐，还是北京电视台，各方都为之投入很多，我们倾注了太多心血。”

《番号》在北京卫视放映了一段时间，收视率尘埃落定后，徐纪周就把手机关了。“创作本身是挺痛苦的过程，既然下一部剧要开始了，就尽量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了。若是总想着番号，怎么都翻不了篇。”

在电视剧的最后，徐纪周以悲剧收场，赚足了眼泪。他坦言，只有最后一笔刻画得比较狠，大家才能记住。“若干年后，只要观众能够记得戏中的人物，我就很满足了。如果20年后，再提起李大本事，大家还会有一种亲近感，觉得这人挺有意思的，那么我们荣幸之至。”徐纪周称，能在中国电视剧的“画廊”里再增添几个人物，这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

陕西文投艺达打造《叶落长安》

本报讯 (记者成长)9月6日，陕西文化产业(影视)投资有限公司正式宣布与西安曲江艺达传媒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出资打造全新品牌——陕西文投(影视)艺达投资有限公司，并将着力推介新创电视剧《叶落长安》。

《叶落长安》是一部反映百姓迁徙的都市情感剧，通过一个河南家庭客居西安的30多年风雨历程，展现了中国百姓的生活变迁。该剧改编自青年女作家吴文莉同名小说，由编剧赵冬苓执笔改编，姚晓峰执导，陈小艺、倪大红、刘涛等领衔主演。赵冬苓表示，这是她参与

改编的第一部电视剧，她看重的就是小说原著中难得的质感。陈小艺在本剧中挑战从17岁到70岁的大跨度表演，她与倪大红也是首次在荧屏上饰演夫妇。该剧计划于明年上半年在北京、陕西、山东、吉林4家卫视首播。

据悉，陕西文投(影视)与艺达传媒联手后，新公司将依托双方的资源优势和品牌竞争力，预计每年投资打造4至5部影视剧目，预计总投资2亿元。由陕西文投(影视)艺达公司联合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投资拍摄的电视剧《异母兄弟》日前也已开机，并成为北京卫视的定制剧目。

MaD 青年创意集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记者钱力)9月10日，由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MaD创不同”、果壳网共同合办的“MaD@北京UCCA”在京开幕。此次活动以“改变自己·改变世界”为主旨，举办了3场跨界人士的对谈，吸引了数百位公众参与。

在对谈环节，香港评论人梁文道、香港艺术家又一山人、香港戏剧导演叶逊谦、青年作家蒋方舟等就科学与艺术、公民与企业、过去与未来三个话题与现场观众进行了

探讨。随机舞蹈工作坊、盲人电影院、自然体验馆，以及即兴戏剧创作等活动，给参加者带来全新体验。

“MaD创不同”即 Make a Difference，由香港当代文化中心主办，是一个让年青人寻找新思维、新力量的平台，启发他们在个人、经济、社会及环境层面上，带动社会的正面改变。明年1月的“MaD全会”将在香港继续举行，届时将会有250位内地参加者获得资助，共同思考改变的可能。

“爱的三部曲”在京开机

本报讯 以“爱”为主题的系列电影《赎爱》、《深爱》、《寻爱》日前在京开机，预计明年5月与观众见面。

据了解，该系列电影将以3个炯然不同的感情故事震撼观众的内心。《赎爱》讲述男主人公在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洗礼后，终于以“非常”的方式，赎回即将逝去的爱，赢得了家庭的幸福，在故事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在以不同角度传递着“爱”的信息；《深爱》讲

述了几个不同性格的年轻人复杂的感情纠葛，有人因爱而恨，有人因爱而疯，无论这几个年轻人经历了怎样的纠结，最后还是“爱”包容了一切；《寻爱》是一部关注留守儿童的电影，该片以小主人公小泽寻找父母的历程为故事主线，呼吁社会关注留守儿童，同时也歌颂了自愿扎根于农村支教的青年女教师的大爱精神，展现了“80后”的道德感和责任感。(杨 钧)

作为工业化的产物，电影恐怕一定要考虑一部分商业的因素。中国电影历史告诉我们，你可以拍非常个人的电影，但你要为观众提供一个“挂钩”。你看上海1930年代的电影，你不能说是纯粹的作者电影，更不能说是商业电影，它们都是艺术价值很高的、有商业因素的电影。我们只能考虑哪些电影真正需要威尼斯电影节这样的平台——它们可能是那种艺术成就很高，同时又有复杂性，需要我们先说服媒体，然后才能得到观众重视的电影。

——马可·穆勒(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主席)

西方类型片的价值观分得很清楚，但凡是类型片，一定注重故事性，西部片、爱情片都是以故事取胜，咱们的武俠片基本上算是一个题材，而不是一个类型。成龙、甄子丹的武打电影，多用拳脚伸张正义，这其实是民族心理的隐喻。中国的武打片依靠一个很大的点是，百年来咱们有民族自卑心理，所以香港贺岁片，甄子丹、成龙的电影，一定要打外国人，要用拳脚战胜枪炮。

——徐浩峰(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竞赛片《倭寇的踪迹》导演)

我希望我的人物能够超越摄影机的控制。最好的电影往往都是冒险地游走在导演、摄影师控制的边缘地带。我希望我能用摄影机表达现实，同时又希望这些东西能不受摄影机的控制。我也希望演员们能感觉不到摄影机的存在。我的工作方式是严格遵循着剧本的精神和需要，在拍摄的时候会完全忘记还有剪辑这回事，在之后的剪辑中，又完全忘记了前面的一切，包括剧本。

——娄烨(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威尼斯日”单元竞赛片《花》导演)

献礼影片无论如何叙事，传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基本理念仍然是创作目标。魅力、时尚、青春是大众消费的重要元素之一，包括偶像经济等，主旋律电影作品在争取更多受众的目标下，需要转型。

——王海洲(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相对比较成熟的类型电影是武俠片和功夫片，但无重大突破，发展遇到瓶颈。把警匪片、惊悚片、悬疑片、社会问题片结合起来，表现中国现实社会，塑造新的平民英雄形象，从而形成新的类型，是类型电影发展的一种路径，值得一试。

——胡克(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纵观近几年中国电影，无外乎以下几种：1.死盯成长市场，用经验和新技术重复过去；2.无论市场与投资环境如何改变，坚持观点，孤独前行，但需外援；3.试图在文艺与市场结合上杀出血路，独树一帜，寥寥无几；4.过高估计自己，还没入门，瞎打乱撞，坑害投资，拍完不了了之；5.衙门定制，审美观念老套，基本以偷票为生。

——何平(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秘书长)

《海洋》：为当代纪录电影提供新范本

范 侃



《海洋》剧照

《海洋》出现在票房竞争最激烈的8月暑期档，同《变形金刚3》、《哈利·波特完结篇》等电影相比，似乎不具备强大的竞争力。尽管这是一部在业内口碑极佳的纪录片，尽管它讲述了一个人类要共同思考的命题，然而《纪录片》3个字足以让院线不自觉地紧缩该片的场次。可是仅仅两周之后,《海洋》的票房已突破了1200万，这确实是一个让电影院没有预料到的结果，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电影观众的一种转变。

雅克贝汉的光影世界

“这是一部以大自然为题材的影片，在拍摄过程中总有惊喜，你设想出一个完美的场面，大自然会比它完美100倍。”在一次采访中，雅克贝汉如是说。从《微观世界》、《迁徙的鸟》到《海洋》，雅克贝汉的电影中始终闪烁着康德式的非功利与真诚。

我们从影片中总能看到那些动物最自然的一面，爬行的虫、飞翔的鸟、游动的鱼，它们用自己的形体展示了大自然最和谐动人的篇章。曾有人问过他是如何接近那些怕生的动物的。他回答，大部分的动物都是怕生的，然而总会找到一些动物，他们根本没见过人，因此反而没有了那种恐惧感，我们拍到的就是那些动物初次的反应。

与大自然生命的沟通，让雅克贝汉的电影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动与灵气。小到虫子，大到蓝鲸，雅克贝汉把摄影机的角度放到一个平等的位置，带着我们去向那些生物问好。当我们看到水中回眸的海豚、空中展翅的老鹰和草丛中避雨の甲虫时，我们不再有着高高在上万灵之首的傲慢，而是

用一种交友的方式审视这个世界，这个我们与其他生物共享的世界。海洋蕴藏了数不清的生命，然而这部电影给予我们的却是一个平等自省重新认知世界的视角。正是这个信念，让他们花数年时间寻找一群从未见过人的动物，我相信他们希望通过摄制组的友善传递出一种模式，即人与自然究竟可以怎样相处；也正是这些真诚的细节，感动了影院里的我们，让我们走出影院后，开始思索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

当代纪录电影的范本

中国电影从世纪初开始的商业化改革到今天，经历了从大片引航到多元绽放的一种变化。特别是近两年中国电影出现了一种井喷的繁荣，从《疯狂的赛车》、《风声》、《十月围城》到《唐山大地震》、《山楂树之恋》、《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再到《武侠》、《最爱》、《雪花秘扇》等作品，国内的电影已经从当年《英雄》、《十面埋伏》一枝独秀的大片时代慢慢过渡到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特别是一些小成本电影如《大人物》、《钢的琴》等也获得了不俗的成绩。

然而从类型片上，我们显然看到了纪录电影的整体低迷。近几年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纪录片可谓寥寥无几，偶有大导演扛鼎，也往往遭遇票房滑铁卢，如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海洋》的出现，可谓打破了纪录片不卖座的

事实，中国人对于纪录片一直有着独特的情愫，从最初的《东方时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间》，到前些年的

政论片《大国崛起》、叙事科教节目《发现之旅》，再到近几年的《故宫》、《水问》、《森林之歌》、《生者》等都获得了不俗的口碑与收视，而电影方面，当年的《帝企鹅日记》与《圆明园》也曾获得了较好的口碑。电视台刻意将大部分的纪录片节目放在晚10点半以后这个白领人群的黄金收视时间，可见当前中国纪录片的潜在受众之多。

因此，《海洋》的意义不止于赋予了我们一场关于自我现状反思的声光饕餮盛宴，更可贵的是一种纪录电影的范本，展现如何将人文与娱乐结合，以关怀为前提收获票房，争取教育与娱乐的双赢。而这也就是当前中国电影需要探索的。

从《三峡好人》到《海洋》

当年曾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大奖的《三峡好人》也在国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然而两天票房仅1200元，最终只有几万元的国内票房让这部电影惨淡收场。同样是纪录电影，同样是真诚的表达，《海洋》的票房竟然是《三峡好人》

的几千倍，耐人寻味。

对于雅克贝汉，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演员。他曾主演过《天堂电影院》、《放牛班的春天》等一系列颇受好评的电影，而《放牛班的春天》更被法国媒体评价为恢复了法国人文主义的光辉。

这种人文主义的光辉我们同样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看到,《微观世界》中温柔地照顾幼虫的甲壳虫,《迁徙的鸟》中好奇而懵懂的小鹰，还有《海洋》中数不清的梦想一般的碎片。尼采曾在《悲剧的诞生》中阐释了两种精神，日神阿波罗的梦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醉，前者通过净化人们的心灵让人们更加热爱这个世界，后者通过释放不愉快的情绪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个世界。显然雅克贝汉选择了日神的表达方式。在他的作品中始终呈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的乐观，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我们都应该以自省的态度敬畏世界，并努力去发掘这世界中的美好，这种表达在他的理念下成了一种普世的世界观。因此《海洋》不

仅在中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更在世界各地引发了狂潮。

相比之下,《三峡好人》同样是诚恳的好作品，与它类似的还有著名的《幼儿园》、《铁西区》、《归途列车》等，这些纪录片被称为独立纪录片，它们本身往往具备一定的小众性，它们的作用不是治愈，而是警示，以鲜明的立场维护着当代中国艺术表达的多元性。这本身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些影片往往不适宜在普通的影院放映。事实上，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也会将电影院分为普通影院和艺术院线，让不同的人有更多选择。

同样是纪录片，同样是真诚的作品,《海洋》取得的成功折射出当代中国观众对记录影像和人文关怀的热爱，同样也显示出纪录影片由于表现形式的不一，决定了它们受众的广度。《海洋》是一个开始，它提供的模式与范本给国内的影视产业带来了一定借鉴，而它体现出的当代观众在多元文化选择中态度的变化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